

石河子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ihezi University

哲学社会科学版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5→5

双月刊

总刊期 119 期

ISSN 1671-0304
CN 65-1210/C

全国百强社科学报
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全国民族地区优秀学报
新疆优秀社科期刊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向西开放”专题研究】

-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亚发展.....卡什巴耶夫·卡尤哈克,塔季扬娜·费利波娃(1)
-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下新疆现代绿洲的结构与功能.....赖先齐,王江丽(4)
- 建立新疆南疆战略稳定支点城市之探.....廖肇羽(9)

【丝路文史研究】(主持人:杨富学)

- 孝顺相承 戒行俱高
 - 论中晚唐五代宋敦煌佛教高扬孝道.....李正宇(14)
- 隋唐宁夏粟特人与丝绸之路.....薛正昌(18)
- 金代贞祐宝券与平凉府社会经济研究.....曹 源(24)
- 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图像遗存
 - 瓜州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绘制年代再探.....马俊锋,沙武田(31)

【法学专题:“刑事司法的理论与实践”】

- 重提“审判中心主义”.....李章仙(39)
- 跨行政区划法院和检察院及其刑事管辖权研究.....宋振策(48)
- 刑事和解模式的现实审视
 - 兼论人民调解委员会刑事和解模式.....林培晓(56)
- 财产性利益的刑事立法完善探析.....陈 焯(63)
- 转型法治:“排除合理怀疑”的法义、语境与功能.....华 雨(72)

- 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与取得时效的衔接问题研究
 - 一种法治建构的微观视角.....包晓丽(81)

【政治与社会】

- 中美双边对话合作机制的演进及启示.....刘长敏,张 敏(89)
- 论英国绥靖政策的错误和教训
 - 兼论二战的不可避免.....李怀顺(96)
- 论“意义治疗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吴新平,张 懿(102)

【古代文学】

- 古代文章奇美的历史样态及审美特性.....陈玉强(108)
- 《郡斋读书志》与宋代政治文化.....黄 静(113)
- 论陆机诗歌艺术成因
 - 从诗体继承与文体影响角度的考察.....袁 丁(118)

学术信息:

- 石河子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成立.....(71)

- 声 明.....(107)

URI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51022.1150.010.html

DOI:10.13880/j.cnki.cn65-1210/c.20151022.005

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图像遗存 ——瓜州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绘制年代再探

马俊锋¹,沙武田²

(1.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榆林窟第 25 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代表性洞窟,因为其中出现的唐蕃特色图像而备受学界关注,属于敦煌学和藏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榆林窟第 25、15 窟是为纪念 783 年唐蕃清水会盟而建的双窟,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与该窟统一集中完成,其绘制年代与该窟营建时代一致,应在 783 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

[关键词]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清水会盟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5)05-0031-08

Image Remains of the Qingshui Treaty Between Tang and Tibetan Regimes Found in Dunhuang Grottoes: Rethinking of the Completion Date of the Marriage Picture of

Yulin Cave 25 in Guazhou

MA Jun-feng¹; SHA Wu-tian²

(1.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2.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Yulin Cave 25 was a representative when Tibetan regime ruled Dunhuang, the Tibetan style images of which arouse strong interests in academic circles, especially in Dunhuang studies and Tibetan studies. Yulin cave 25 and cave 15 were constructed as a double grotto in memory of the Qingshui Treaty set in the year of 783 between Tang and Tibetan. The marriage picture and the whole cave of Yulin Cave 25 in Guazhou were completed simultaneously, which was around the year of 783 when the Tang and Tibetan Qingshui Treaty was concluded.

Keywords: Yulin Cave 25; Marriage picture; Qingshui treaty

瓜州榆林窟第 25 窟是吐蕃统治时期的代表窟,洞窟壁画中出现反映唐代艺术和吐蕃特色的图像,为敦煌学和藏学界所关注,研究成果颇丰。其中,洞窟主室北壁弥勒经变中的婚嫁图,因为同时出现身着唐装和蕃装的人物,一直以来是研究唐蕃关系的珍贵资料。对于该幅图像,学者们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这幅画面提供了参考,

但是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近年来,针对此幅婚嫁图及其相关问题,有学者不断撰文发表新论,颇有不同意见,单就其绘制时代而言,有将其归入 821 年唐蕃长庆会盟之后,还有认为属于曹氏归义军时期之说,与传统所说吐蕃前期意见出入较大,因此有必要作些澄清,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收稿日期]2015-04-25

[网络出版时间]2015-10-22 11:5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粟特美术影响下的敦煌石窟图像研究”(13BKG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石窟粟特美术研究”(13JJD78005)。

[作者简介]马俊锋(1988-),男,甘肃宁县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敦煌学、佛教美术史研究;沙武田(1973-),男,甘肃会宁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敦煌学、佛教美术史研究。

一、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研究史述评

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图 1)是敦煌石窟现存 46 幅婚嫁图中唯一一幅反映汉藏通婚的场景,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其人物族属与身份的辨识不统一,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对新娘的确认,围绕对新娘的辨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图 1 榆林窟第 25 窟婚嫁图

第一种观点以谭蝉雪^[1]、王惠民^[2]二位先生为代表,认为跪地叩拜着吐蕃装的新郎是汉人,新郎右手边着吐蕃装作揖的新娘是吐蕃人。此观点影响到罗世平^[3]、马德^[4]、沙武田^[5]、刘颖^[6]等先生,受传统“男跪女揖”形象的影响,他们也以为跪地叩头的新郎旁边着吐蕃装作揖者就是新娘,虽然他们觉得有许多疑惑,但还是没有说明其中的不妥。事实上,新娘的确认尽管很重要,但也并不妨碍我们对其绘制年代的判断。此外,赵小明先生这样描述这幅婚嫁图:“新郎、新娘头裹红毡,宾客头戴小礼帽,侍女著翟翟服。五体投地的新郎是吐蕃族,凤冠披帛的新娘是汉族”^[7]。可以看出,前部分赵小明先生提出的新郎、新娘头裹红毡的说法仍然沿用谭蝉雪、王惠民二位先生的观点,认为着吐蕃装的新娘是吐蕃人,但是后部分他也提到凤冠披帛的新娘是汉族,说明他似乎已经看出了新郎左手边背对着我们三个着汉装的女性,中间的是新娘,只不过,他对新娘的说法似乎很矛盾。

第二种观点主要认为,跪地叩拜着吐蕃装的新

郎是吐蕃人,背对着我们着汉装的三个汉族女性,中间的是新娘,旁边两个是侍女。就目前收集的资料来看,早年,段文杰先生对这幅婚嫁图有过这样的描述:“这里画大青庐(帐房),帐内置长案,置山珍美味,男女宾客对坐宴饮,帐外设屏障,一对藏男汉女在宾相待陪下举行婚礼,礼拜时‘男跪女不拜’。宴会的宾主侍婢中有汉也有藏,虽然这一婚礼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它应该是当时汉藏联姻历史的反映。”^[8]接着,张伯元先生将这幅婚嫁图描述为:“画面上门外搭帐幕,内设屏风,帐内宾客对坐,帐前新郎着吐蕃装下跪礼拜,新娘与伴娘着汉装立于一旁,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北方以‘青幔为屋’和行礼时男跪女不拜的婚礼习俗。”^[9]冯力先生对这幅婚嫁图有这样的描述:“为举行婚礼,在门外搭起了帐幕,内置屏风,帐内宾客对坐,帐前举行婚礼,新郎着吐蕃服装,五体投地跪拜,新娘和伴娘着汉装立于一侧,它反映了当时北方婚礼以‘青幔为屋’,以及行礼时男拜女不拜的习俗,是一幅唐代的风俗画。”^[10]后来,曹洪勇先生将这幅婚嫁图描述为:“吐蕃风格的嫁娶图:图中画有青庐(帐篷),内有男女宾客宴饮,一对青年男女在宾客的陪同下正举行婚礼,男士穿吐蕃装,女士穿汉装,宾客中也有吐蕃人,反映了那时汉、藏人民和睦相处的情况。”^[11]黄维忠先生将其描述成:“其北壁弥勒经变婚嫁图中出现的新郎、伴郎均着吐蕃装,此外宾客、侍从也有着吐蕃装者。”^[12]可见,黄维忠先生其实辨识出了新郎和新娘。此外,霍巍先生写到“如同许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在弥勒经变东侧的婚嫁图中,有两个人物形象着吐蕃服饰,两个人物一男一女分立于主人两侧,女子头结高结,男子以头巾束头,均身穿带有三角形的大翻领长袍,腰间结带,脚穿乌靴……就在这幅婚嫁图中,当中主人的形象仍为唐装,其身份似更加显贵,而两位着吐蕃装的人物侍立于两侧,身份似为其侍从”^[13]。可以看出,霍巍先生对新郎和新娘的辨认是正确的,不过他可能把男宾相当成了这位头戴透额罗幞头汉族男性的侍从。李妍容先生写到:“榆林 25 窟婚礼图中便可明显看出吐蕃族与汉族

参见谭蝉雪:《敦煌石窟全集·民俗画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4页。

通婚的场景,新人立于青庐中围屏内行礼,新郎为吐蕃族,头戴毡帽,新娘凤冠霞帔,为汉族。男女宾客汉蕃皆有,分列于长桌两侧,相互谈笑。”^[14]从以上叙述可看出,段文杰、张伯元、冯力、李妍容、曹洪勇以及黄维忠等先生颇有见地,已经辨识出着吐蕃装跪地叩拜的是新郎,着汉装的三个汉族女性,中间的是新娘,只是他们没有具体说明而已。

最近,陈于柱、张福慧先生发表新作《榆林窟第25窟“藏汉婚礼图”的再研究》^[15],首次对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中的每一个人物身份及族属作了新的考订和详细说明,使人物身份更加清楚,使我们对这幅婚嫁图有了新的认识,值得参考。他们认为桌案前跪地叩拜着吐蕃装的是吐蕃族新郎,新郎右手边着吐蕃装作揖的是新郎的一个吐蕃族伴郎。新郎左手边站着的三个着汉装的汉族女性,中间为新娘,新娘左手边是一执长柄团扇的侍女,新娘右手边也是侍女。桌案上,头戴透额罗幞头、着汉装的可能是新郎的汉人岳父,他对面可能是新郎的汉人岳母,他右手边是新郎另一个吐蕃族伴郎,他左手边双手捧着盘子的为汉人侍从,因此二位先生认为榆林第25窟婚嫁图是吐蕃族的新郎在汉人的新娘家向岳父母或宾客拜堂行礼时的场景。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二位先生认为该幅婚嫁图的绘制时间绝对不会出现在吐蕃统治时期,而应该在曹氏归义军时期,从而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颇有新意。

另外,罗世平^[3]、刘颖^[6]先生把敦煌石窟中出现的吐蕃装图像均归入长庆会盟之后,他们认为榆林窟第25窟这幅婚嫁图也属于长庆会盟之后的作品,显然此观点不能成立,而王中旭先生认为长庆会盟后唐蕃开始有文化交流与使节往来,才可能会出现像敦煌石窟《维摩诘经变》中中原帝王与吐蕃赞普相向而立的画面^[16]。三位先生对吐蕃装人物进入敦煌石窟壁画时间和社会历史背景原因的分析是相同的,他们一致认为吐蕃装人物进入敦煌石窟是长庆会盟后才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把唐蕃长庆会盟的时间和事件作为判定敦煌石窟中蕃装人物出现的唯一标准,我们认为是极不妥的,对此拟作另文专论,在此不赘。

纵观学者对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的辨识,主要是对新娘的确认,现在看来,第一种观点明显站不住脚,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其中陈于柱、张福

慧二位先生对人物身份的考订,使人物身份及族属更加清楚,令人信服,但是其中仍有许多问题值得商榷。首先,笔者现场仔细看过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新娘左手边的伴娘确实存在一个漫漶的长条形图形,但其前端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圆形弧线,而好像是新郎所跪地面的线纹,并且其前部漫漶部分要比敦煌石窟其他婚嫁图中新娘所持有的团扇前部小很多,而且伴娘似乎并没有手持团扇的动作。尽管如此,丝毫不妨碍我们对新娘及侍女身份的确认。至于二位先生提出的新郎的岳父母以及岳父右手边为男伴郎的可能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认,虽然学界对人物身份及其族属的认识不统一,但是也并不会妨碍我们对这幅婚嫁图的理解。就目前来看,我们比较肯定的是着吐蕃装的吐蕃族新郎、新郎旁边作揖的吐蕃族男傧相、着汉装的汉人新娘及其两边的汉族侍女,双手捧着盘子的为汉人侍从;其次,陈于柱、张福慧二位先生认为这幅婚嫁图绘制年代绝不会是吐蕃统治时期,他们将其创作年代考订在曹氏归义军时期,笔者实在不能苟同,以下将对其作以交代。

二、洞窟统一集中完成再辩

陈于柱、张福慧二位先生在文中将这幅婚嫁图考订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是接受了今枝由郎先生关于各壁创制年代不同的观点。对此有必要再作说明。今枝由郎先生完全赞同马修·凯普斯坦关于榆林窟第25窟是汉藏为纪念821—822年和盟开凿的德葛玉采寺^[17]的观点,所以他以东壁的T形榜子为切入点,认为东壁仅保存有T形题记框的八大菩萨曼荼罗最先以藏式风格绘制,将其时间断定在786—848年,其他各壁仅保存有竖形题记框的壁画可能为848年汉族恢复在这一地区统治后绘制,并且他认为东壁T形题记框而其他各壁为竖形框,之所以有这种差异是因为848年汉族恢复在这一地区统治造成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所以就没有必要再绘T形框,只绘制竖形框^[18]。对今枝由郎先生的观点笔者认为有以下不妥:

第一,今枝由郎先生极力支持的马修·凯普斯坦先生关于榆林窟第25窟是为纪念821—822年“汉藏和盟”而建立的德葛玉采寺的观点已被黄维忠^[19]先生否定,现在看来,榆林窟第25窟不是纪念汉藏和盟而建立德葛玉采寺,实际上,德葛玉采

寺并非榆林窟,而是孔古寺。不过,马修·凯普斯坦先生也注意到虽然各壁壁画风格有所不同,但是它是同一艺术家在同一时期绘制而成,榆林窟第25窟无论是图像上还是风格上体现了汉藏世界和谐共存^[17],显然马修·凯普斯坦先生是赞同该窟作为整体性同时期开凿绘制,值得我们参考,也即说明今枝由郎先生的观点不妥。

第二,今枝由郎先生将各壁不同形式的题记框归结为848年汉人恢复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显得简单化,尽管T形榜子仅出现在吐蕃期洞窟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吐蕃期洞窟中就一定要出现T形榜子,更并不意味着吐蕃期洞窟就没有必要用或者不必用竖形榜子,非要等到848年汉族恢复这一地区后才能用竖形榜子?敦煌莫高窟吐蕃期洞窟有那么多竖形榜子又作何解释,我们以为以吐蕃在敦煌地区统治结束来判断和解释榆林窟第25窟各壁出现的不同形式的题记框显然不合理,对此笔者曾作专文讨论,认为T形题记框仅出现在东壁八大菩萨曼荼罗中,是因为其粉本来自藏地,汉地画工、画匠对其不熟悉,为了忠实地反映其题材,同时考虑到汉藏两地信众的需要,易于他们接受,创制了T形榜子,也说明了该铺造像的独特性,并且T形榜子只写汉文,是因为洞窟功能的内修性,并且作为整体性地营建于776—786年的榆林窟第25窟,承担着汉藏友好的角色,所以T形榜子被有意省去,其他各壁都为汉地传统题材也就没有必要书写T形榜子^[20]。

第三,据赖文英^[21]、赖鹏举^[22]先生研究,从洞窟所承担的思想义理和仪轨角度来看,洞窟的整体结构性很强,体现的是北传三重华严含摄和南传中印密法的互动。显然洞窟功德主或者洞窟营建者对其图像传达出的含义及其所要承担的汉藏交流与互动角色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更加肯定了我们对于榆林窟第25窟各壁作为同时期营建判定的正确性。

总之,该窟主室以及前室东壁两侧南北两天王绘制时代与洞窟开凿时代一致,统一集中完成,已是学界共识,不容置疑。

三、榆林窟第25窟建于783年清水会盟前后

关于榆林窟第25窟的营建时代,学界关注较多,成果颇丰,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榆林窟第25窟建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谢继胜、黄维忠^[23]、陆离^[24]、罗世平^[3]、刘颖^[6]等先生认为其建立于吐蕃统治敦煌后期。段文杰^[25]、史苇湘^[26]等先生更倾向其建于吐蕃统治敦煌初期,其中沙武田先生注意到瓜州陷蕃(公元776年)比沙州陷蕃(公元786年)早十年,并分别对榆林窟第25窟壁画艺术风格、与莫高窟中唐壁画艺术之比较、弥勒经变中的吐蕃人物以及藏文题记等进行分析,认为榆林窟第25窟是在瓜州吐蕃前期即“盛唐吐蕃期”营建,即榆林窟第25窟应当营建于公元776—786年^[5]。根据我们最近研究,据《寺塔记》记载:“静域寺,佛殿内,西座番神甚古质,贞元已前西番两度盟,皆载此神立于坛而誓,相传当时颇有灵。”^[27]谢继胜先生认为此处贞元以前(公元785—804年)两度盟的“番神”为吐蕃毗沙门天王像,而且是像榆林窟第15窟库藏神形象者。“西番两度盟”是指唐蕃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赤岭会盟和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吐蕃将赞普比作毗沙门天王,故唐蕃会盟时天王作为吐蕃神立于祭坛。因清水处于长安正西,丝绸之路主道,而净域寺是唐京城名寺,所以唐蕃公元783年清水会盟后将吐蕃式的毗沙门天王像留到净域寺合情合理^[28]。沙武田先生认为榆林窟第15、25窟是同时营建的双窟,榆林窟第15窟前室北壁吐蕃式库藏神以及榆林窟第25窟前室东壁北侧吐蕃武士装样式毗沙门天王像与清水会盟有关^[29]。笔者另撰文认为,榆林窟第25窟应为某位曹姓人士为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公元783年任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而建,纪念和赞颂他促成唐蕃清水会盟使唐蕃和好的功德,具体建窟时间应在公元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同时认为榆林窟第25、15窟实为纪念清水会盟而建^①。这里顺便提一下,榆林窟第25窟建于公元783年清水会盟前后,且主室与前室东壁两侧南北两天王统一完成。罗世平、刘颖二位先生以吐蕃装人物为标准,认为吐蕃装人物

马俊锋、沙武田:《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历史遗迹——瓜州榆林窟第25窟功德主新解》,《西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15-22页。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因编辑不当,导致引文的出处出现错乱,请读者参考时注意并请谅解。

进入敦煌洞窟是吐蕃后期才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明显不妥,他们以此将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绘制时间判定在吐蕃统治敦煌后期,明显错误。陈于柱、张福慧二位先生所论述的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绘制于曹氏归义军时期,就更加不可能了。

四、婚嫁图绘制年代再辩

笔者认为,以吐蕃装人物和曹氏归义军时期汉藏通婚合法化为标准来判断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绘制年代,明显不妥。既然榆林窟第25窟营建于公元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该窟主室与前室东壁南北二天王又统一集中同时期完成,该婚嫁图也一定是绘制在公元783年清水会盟前后,那么陈于柱、张福慧二位先生仅仅依据曹氏归义军时期汉藏通婚的合法化才有可能出现汉藏通婚场景,而将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绘制时间考订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显得简单而欠考虑,更应该综合考虑洞窟整个情况。

对于陈于柱和张福慧二先生所论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诸问题,笔者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讨论:

第一,二位先生只考虑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汉藏通婚合法化,出现汉藏婚嫁场景的合理性,却忽略了将其考订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最明显的就是其与人物造像的衣冠服饰和洞窟壁画绘制风格相冲突。二位先生认为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图1)与晚唐莫高窟第12窟南壁婚嫁图(图2)构图模式极为接近,我们将这两幅婚嫁图与榆林窟五代第20

窟南壁婚礼图(图3)比较就会发现:榆林第25窟婚嫁图中二位先生所谓新郎的岳父,身着袍衫,头戴软脚(垂脚)透额罗幞头,莫高窟第12窟婚嫁图中新郎和伴郎头戴翘脚幞头,曹氏归义军时期基本完成了软脚(垂脚)幞头向翘脚或硬脚展翅幞头的转变,更多的会首着硬脚展翅幞头(图4),前述榆林窟第20窟婚嫁图中新郎以及男贺礼者均首着翘脚幞头。据学者们的研究可知,唐五代宋时期壁画中的幞头的图像是有断代意义的^①,结合以上婚嫁图所在洞窟的时代,也是契合的。考察榆林窟第25窟全窟壁画,北壁弥勒经变中老人入墓、路不拾遗(图5)、树下写经和诵经(图6)以及南壁观无量寿经变未生怨中的男性(图7),均首着软脚(垂脚)幞头,身着袍衫,其着装更像莫高窟盛唐第130窟甬道北壁人物着装(图8)。另外,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所在的北壁老人入墓图中,老人左手边出现的女性(图5),著袒胸上襦、披帛,完全是盛唐才有的穿着风格,而南壁十六观中的卫提希夫人也一派唐装(图9),以上两幅画面中女性人物着装以及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中三位汉族女性(中间为新娘,其两边为侍女)着装都与莫高窟盛唐130窟甬道南壁都督夫人礼佛图中的女性着装近似(图10),属盛唐气象。显然从壁画绘制风格以及人物造像上来看,榆林窟第25窟的婚嫁图绝不会出现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总之,这一窟绘画具有盛唐风格,已是学界共识,不容置疑,而该窟建于783年清水会盟前后(莫高窟的盛唐时期),处在吐蕃



图2 莫高窟第12窟男跪女揖行礼



图3 榆林窟第20窟南壁站立拜堂

参见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9-362页;谭蝉雪:《敦煌石窟全集·服饰画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1-102页;魏健鹏:《敦煌壁画中幞头的分类及其断代功能刍议》,《艺术设计研究》2013年第2期,第11-18页。



图 4 榆林窟第 16 窟甬道曹议金供养



图 5 榆林窟第 25 窟北壁老人入墓、路不拾遗



图 6 榆林窟第 25 窟北壁树下写经、诵经



图 8 莫高窟第 130 窟甬道北壁官员公服 (段文杰摹)



图 7 榆林窟第 25 窟南壁未生怨



图 9 榆林窟第 25 窟南壁十六观

统治之下,之所以具有盛唐风格,则是因为瓜州陷蕃(公元776年)比沙州陷蕃(公元786年)早十年,即沙武田先生所谓之瓜州榆林窟“盛唐吐蕃期”^[5]。



图10 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壁都督夫人礼佛图
(段文杰摹)

第二,如前所述榆林窟第25窟主室壁画、前室东壁南北二天王绘制时间与该窟开凿时代一致,是在公元783年清水会盟前后,而前室东壁南侧南方天王像下方已有“光化三年”汉文墨书题记,为巡礼人之题名而非窟主之题记^[30],很显然已经证明此窟开凿早于“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也即证明该婚嫁图绘制年代必定早于公元900年,所以其绘制年代也绝对不会在曹氏归义军时期。

第三,北壁弥勒经变中的藏文题记,谢继胜、黄维忠二位先生释读为:“曹氏幼弟施画此铺圣图,此乃尚希之公德,甚佳!”^[23]大概意思为某位曹姓人士为藏人“尚希”开凿的功德窟。后经陆离先生确认藏文题记中的“shangshevi”只能为“尚书”的翻译,榆林窟第25窟是某位曹姓人士纪念和赞扬当时吐蕃东道节度使与唐蕃和好或治理河陇地区的功绩而为其建造的功德窟^[24]。经我们研究,藏文题记中“尚书”应为尚结赞,榆林窟第25窟实为某位曹姓人士为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纪念和赞颂他促成唐蕃清水会盟使唐蕃和好的功德,具体建窟时间应在公元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那么汉藏和谐共存的婚嫁图出现在为纪念清水会盟而建榆林窟第25窟中,并不奇怪。另

外,前不久在作为双窟的榆林窟第15窟前室甬道新发现了吐蕃供养人,也为该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①,更加说明了该窟功德主为吐蕃人的可能性,该窟应建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而不是曹氏归义军时期。再者,从婚嫁图本身来看,正如陈于柱、张福慧二位先生所言,婚嫁图中的汉人并没有出现吐蕃统治下的紧张感,显得很轻松自然,正是此婚嫁图承担着公元783年清水会盟汉藏友好角色。

第四,榆林窟第25窟东壁八大菩萨曼荼罗,作为一种新样式来源于吐蕃,主尊完全是密教的大日形象,榜题是汉地的“清净法身卢舍那佛”,旨在强调该窟的华严含摄;前室东壁北侧的毗沙门天王组合造像,其中毗沙门天王和虎皮持鼠者两个形象都是源自吐蕃的图像系统^[31]。再结合榆林窟第25窟藏文题记、婚嫁图中吐蕃装人物、T形椅子、前室东壁北侧吐蕃武士装样式的毗沙门天王像来考虑,如此丰富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和浓郁吐蕃风格图像的出现,只能是吐蕃统治敦煌历史的反映,绝不可能在曹氏归义军时期。

综上所述,榆林窟第25、15窟是为纪念公元783年唐蕃清水会盟而建的双窟,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绘制年代与该窟营建时代一致,应在783年清水会盟前后。诚然,曹氏归义军时期伴随着汉藏通婚的合法化出现如榆林窟第25窟的婚嫁图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敦煌吐蕃期洞窟中就不能出现汉藏通婚的场景,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出现在为纪念公元783年清水会盟而建的榆林窟第25窟,就是很好的例证,其反映的是唐蕃清水会盟友好的历史。

五、结 语

榆林窟第25窟北壁弥勒经变中的婚嫁图绘制时间,绝对不可能如陈于柱、张福慧二位先生所认为的在曹氏归义军时期,其出现在榆林窟第25窟有其独特的意义,但并不是如二位先生所论述的那样,是因为曹氏归义军时期汉藏通婚的合法化而出现的一幅普通的汉藏婚礼图,而更加准确的历史事实,是用来表现公元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友好,是吐蕃统治瓜州初期汉藏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的见证。

图版及相关研究成果均未刊。

榆林窟第25、15窟是为纪念公元783年唐蕃清水会盟而建的双窟。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与该窟集中统一完成,其绘制时间与该窟营建时代一致,应在公元783年清水会盟前后,其出现在为纪念清水会盟而建的榆林窟第25窟中再合适不过,是对清水会盟的纪念,反映的是唐蕃联姻和唐蕃友好的历史,是吐蕃占领瓜州初期,汉藏人民以佛教石窟为载体,为我们展现了公元783年清水会盟前后瓜沙地区汉藏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一个侧面。

[参 考 文 献]

- [1]谭蝉雪.敦煌石窟全集·民俗画卷[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138.
- [2]王惠民.敦煌石窟全集·弥勒经画卷[M].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74.
- [3]罗世平.身份认同:敦煌吐蕃装人物进入洞窟的条件、策略与时间[J].美术研究,2011(4):58-65.
- [4]马德.小议敦煌壁画中的蕃装人物[C]//敦煌研究院.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2:94-108.
- [5]沙武田.关于榆林窟第25窟营建时代的几个问题[C]//藏学学刊:第5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79-104.
- [6]刘颖.莫高窟吐蕃后期洞窟建造年代判定——以蕃装人物为中心[J].中华文化论坛,2013,(5):65-71.
- [7]赵小明.敦煌婚礼图中的少数民族因素[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0,(3):28-31.
- [8]段文杰.藏于幽谷的艺术明珠——榆林窟第二五窟壁画研究[M]//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艺术·榆林窟第二五窟附第一五窟.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11.
- [9]张伯元.安西榆林窟[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21.
- [10]冯力.榆林窟第25窟壁画的几点认识[J].南通师专学报,1996,(3):38.
- [11]曹洪勇.敦煌石窟T形题记叙论[J].陕西社会科学论丛,2001,(4):41.
- [12]黄维忠.德葛玉采会盟寺(de ga g·yu tahal gtsigs kyi gtsug lag khang)考——再论该寺非榆林窟[J].敦煌研究,2009,(3):93-99.
- [13]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90.
- [14]李妍容.敦煌壁画中的婚嫁图[J].文化月刊,2013,(8):68.
- [15]陈于柱、张福慧.榆林窟第25窟“藏汉婚礼图”的再研究[J].民族研究,2014,(2):86-92.
- [16]王中旭.敦煌吐蕃时期《维摩变》新样研究[C]//丁宁,李淞.全国美术学博士生论坛论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66-75.
- [17][美]马修·凯普斯坦:De-gag·yu-tshal(榆林窟)之会盟寺的比定与图像[C]//霍巍、李永宪.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98-127.
- [18][日]今枝由郎.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T形题记框[C]//张长虹,译.藏学学刊:第五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79-104.
- [19]黄维忠.敦煌藏文发愿文研究概述[J].敦煌学辑刊,2007(1):29-39.
- [20]沙武田.榆林窟第25窟T形榜子再探[J].敦煌研究,2011(5):28-34.
- [21]赖文英.唐代安西榆林25窟之卢舍那佛[J].圆光佛学报,1999,(4):340-345.
- [22]赖鹏举.中唐榆林25窟密法“卢舍那佛”与佛顶尊胜系造像的形成[J].中国藏学,2007,(4):18-23.
- [23]谢继胜,黄维忠.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J].文物,2007,(4):70-78.
- [24]陆离.关于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的两个问题[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54-57.
- [25]段文杰.榆林窟第25窟壁画艺术探讨[J].敦煌研究,1987,(4):1-10.
- [26]史苇湘.地方因素是研究佛教艺术的起点和基础——兼论榆林窟25窟壁画[C]//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657.
- [27][唐]段成式.寺塔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23-24.
- [28]谢继胜.榆林窟15窟天王像与吐蕃天王图像演变分析[J].装饰,2008,(6):54-59.
- [29]沙武田.一座反映唐蕃关系的“纪念碑式”洞窟——榆林窟第25窟营建的动机、思想及功德主试析[C].西部考古:第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287.
- [30]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J].文物参考资料,1951,(5):83.
- [31]李翎.图像辨识习作之一——以榆林窟第25窟前室毗沙门天图阶段性认识为中心[C]//敦煌研究院.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2:375-398.

(责任编辑:赵旭国)